

国际共运史教学参考资料

关于斯大林问题

第五辑

(教学用书·内部参考)

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
杭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室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说 明

本书仅供内部研究时参考之用，因此所印文章都按原文刊载，不作删节；篇目基本上按发表时间次序编排。

由于历史情况的变化，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和提法，需要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加以对待和评定。有些观点已经明显不妥（如对南共领导的评论），希读者注意。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目 录

1、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1926年11月）

讨论斯大林《联共（布）党内问题》报告的发言述载

曼努伊尔斯基的发言

加米涅夫的发言

李可夫的发言

台尔曼的发言

洛佐夫斯基的发言

蔡特金的发言

.....（ 1 ）

2、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 120 ）

3、斯大林主义：自上而下的革命

.....罗伯特·C·塔克（ 143 ）

4、对我国出版关于苏联著作的看法

.....（法）让格纳巴（ 188 ）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 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11) 讨论斯大林《联共(布)党 内问题》报告的发言选载

曼努伊尔斯基(联共〔布〕)

我想详细谈一谈那个具有非凡重要性的原则问题,也就是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由于反对派发言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到了报告人即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上;其次,因为这个问题,对于联共(布)党来说,有着极其紧迫的意义。当前,我们的十月革命及其领导者联共(布)党,已经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就不能不是带有国际性质的问题;最后,第三,一些客观的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我指的是旨在提高各国共产党的积极性的口号。在我看来,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各兄弟党在它们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比对联共(布)的意义来得小。我很想回避论战,因为反对派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同志提

出的这类争论问题，有使论战的本质被淹没在与事业没有直接关系的琐屑小事中的危险。但是，由于我们不是在科学院，又因为我不是那标榜恕道和不用暴力抗恶的基督教道德的信奉者，于是我终究只好予进攻者以若干回击。在转入实质性的问题之前，我先就托洛茨基同志的演说作几点声明。

头一点是关于我个人方面的情况。托洛茨基在这里援引了我1917年底发表于《真理报》、1918年由党的“惊涛”出版社出版的一篇文章的一处，那里我对“不断革命论”作了错误的评价。通常，在政治斗争中，当有人从文书档案中挖出旧的错误观点时，那个被指责犯了这种错误的人，往往力图从当时的环境加以解释，表白那是言不由衷的，推说论敌曲解了它们，同时，从同一组文章中摘出另一些引文，以便使听众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作者并不是这样理解的，如此等等。我们的反对派在最近几个月的党内争论中创造了这方面的成套经验。我认为这种方法是不诚实的。我公开声明，前述的我所说的那种观点，是理论上的政治性错误。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当处于召回派的队伍中时，我还有过更严重的错误。党知道我的错误；必要时，党也从中作出了一切相应的结论。但是，党也知道，我从来没有把我的错误观点强加于她。我希望托洛茨基同志能象我所表现的那样，也用这种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

第二点声明是有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什麦拉里同志的攻击。托洛茨基嘲讽什麦拉里同志的演说，暗示他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过去，说什么不需要什麦拉里来给托洛茨基这位十月革命的活动家以革命热忱的训教。什麦拉里同志从来没有否认过，他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许多老的活动家一样，是从第二国际队伍

中过来的，他从不否认，他在过去犯过政治错误。但是，难道托洛茨基同志自己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过去？难道他有资格扮演对什麦拉里的不容抗辩的审判官角色吗？我请诸位回忆一下（虽然我是第一次想起它）同取消派的联合自由的口号有关的那件事。这是在那样的时期，当时我们党正同处心积虑地力求使我国工人运动合法化、使工人运动迎合沙皇口味的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着奋不顾身的斗争，就在这样的时刻，托洛茨基却同极右的孟什维克站在一起，不仅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而且甚至反对左翼孟什维克即普列汉诺夫分子。诚然，过去我们同什麦拉里同志之间确实有过斗争。在这个大厅里，我们就反对过什麦拉里同志的某些错误，然而自什麦拉里同志对共产国际承担职责之时起，有谁能找出即使是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敢于断定，什麦拉里同志没有履行这些职责？1920年，什麦拉里同志与其他捷克同志一起，使捷克党——不是四分五裂的，而是包括了它的全体年轻的和老一辈工人的统一的党——加入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个党现在成了共产国际的最坚强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那个与著名的布勃尼克有关的危机^①之后，什麦拉里同志，如同一个守纪律的士兵，“没有二话”，并且执行了自己的党和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托洛茨基同志能说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吗？这里有托洛茨基同志在党的活动方面最重要事件的简明清单。1921年，喀琅施塔得暴动前夕，当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有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遭受覆灭之虞时，托洛茨基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他向我们建议把工会同国家“拧在一起”，进一步推进已经危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结合的命运的战时共产主义，并使之走得更远。

1923年，第一次经济困难的时刻，托洛茨基通过发动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争论给党以新的打击。托洛茨基同志目前的同盟者加米涅夫当时曾正确地指出，这是党外民主制利用托洛茨基同志的手来敲我们党的门。

1924年，托洛茨基现在拒不承认的关于“十月的教训”问题的新的争论。党和国家经过两年无谓的动荡，为的是把关于“十月的教训”的过时观点扔到垃圾箱里去，——这就是这次争论的“教训”。

1926年10月——“航空仪表厂支部事件”。

最后，1926年12月9日，反对派背弃自己10月16日的声明，把争论转到共产国际的绝望企图。

什麦拉里同志从来不这样做。什麦拉里同志转向共产主义，他买了直到终点站的票，另外有些人则想往复多次购买这种票。我想，如果我说我们认为转向共产主义的人要比离开它的人好一些，我是反映了共同的心声。（鼓掌）为什么托洛茨基嘲讽什麦拉里，可为什么他对苏瓦林却不置一辞？这是因为托洛茨基同苏瓦林比同什麦拉里更靠近些。

①指二十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危机，由于中央决定开除布勃尼克出党而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关于这次危机及共产国际对这次危机的态度，可参见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1925.3.21——4.6）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决议，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二册，三联1965年中文版，第162—167页。——译者注

我想作的第三点声明所涉及的，是托洛茨基就其与不断革命论相联系的错误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提出解释的方式本身。托洛茨基在这里向与会者扬言，在关于不断革命论的争论中，正确的是列宁和我们党，但是不是共产国际执委扩大全会的全体成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般都是很晚才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的。用这种手法同全会成员说话意味着什么呢？在过去沙皇俄国，那些没落的贵族们当其落到普通人的社会中时，总是经常毫不迟疑地向人们暗示自己的高贵。不管托洛茨基过去有过多大的资本，可是现在他已经将它花尽了，这样，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允许自己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成员。如果年轻的一代革命者在战后才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不是他们的过错。用粗暴的嘲弄耍了这样的态度之后，托洛茨基大喊大叫要向“高级会议”申诉。共产国际执委扩大全会的参加者都是普通人，在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革命的粗工。他们完全不会俯首听命于这种祷念着“高级会议”咒语的议会手段。这种论战把戏在资产阶级议会里或许有效，但是在共产党人的会议上却根本无用。

不应该这样引证

现在,我转到问题的实质方面。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了证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连篇累牍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对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些最重大的问题所持的看法,对我们,特别是对我们当前这个新问题、对共产国际必须予以处理的独特局势确是有着巨大的意义。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有害的和缺乏说服力的,他所采用的选择引文的方法是不顾及这一或那一著作写作时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和任务。为了证实我所说的意思,这里我只从恩格斯的引文中举一个例子。184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作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初草稿,后来它以《共产主义原理》为题重版。这个草稿的第十九节恩格斯提出的问题是:

“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

对此,恩格斯回答道: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决不会是民族的,而将是在一切文明国家,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①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译者注

这段引文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说的是，不仅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是暂时孤立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般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季诺维也夫同志不仅在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是对的，而且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他也是对的。在十月的日子里，错的不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而是俄国无产阶级，它在没有同时革命，至少是在四个文明国家没有革命的形势下，胆敢握取政权。（鼓掌）

反驳恩格斯的这一观点的历史事实是我们的十月革命。要是恩格斯活到我们的时代，毋庸置疑，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定会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划清界限的，因为恩格斯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呆子，而是它的天才创始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怎样利用这段引文来对待我们的十月革命的。很明显，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了证明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的原理，就只得步社会民主党人的后尘。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列宁著作的引文采取更坏的手法。俄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连续三个阶段。与这三个阶段仍适应，无产阶级与联共（布）面临着不同的任务：（1），第一阶段——十月革命前夕。当时向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提出的是下面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否通过利用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战时的帝国主义矛盾，依靠渴望土地的农民和要求和平的军队而夺取政权？十月革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2）第二阶段，包括从十月革命直到喀琅施塔得叛乱，是革命为争取自身的生存而斗争的时期，它必须反击内外反革命的疯狂进攻。那时，我们无法顾及社会主义建设。俄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守住阵地，直至世界王

人运动后备大军的到来。1918年的德国革命减轻了这个任务。(3),最后,目前所处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已经成了无产阶级政党注意的中心。我们采取巧妙的迂回机动,其目的是为要在我国消灭资本主义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在去世前用颤抖的手给党写下了自己的遗言:“维持二十年同农民的正确关系——革命胜利的保证就在于此”。

我们可以从我国革命发展这个第三阶级中向季诺维也夫同志举出几处引文来驳倒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有提法。而他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他知道,正是在我们粉碎了反革命力量之后,在历史开始向我们提供多年时间以从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不是别人,恰恰正是列宁为我们党规定了在这些年中的目前正由我党的中央委员会所执行着的路线。无论是在1918年,或者是在1919年,我们都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不拘通过哪种形式力求从欧洲无产阶级那里争取到刻不容缓的支持,以免在内战中遭受失败。现在,要是不顾及所有这些情况,从列宁同志的著作中搜集一些引文,再任意添油加醋,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会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其书中奉献给人们的那种“列宁主义”,即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同志结盟后被丢弃了四分之三的那种“列宁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种引证方法是对悼念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侮辱。

关于悲观主义倾向及其根源

同志们，如果你们用心观察同俄国革命这三个阶段相应的我党党内的倾向的发展，那么你们就会确信，虽然各个阶段的党内倾向显出表面上的差异，然而无信心和悲观主义却是它们共有的特性；这首先是本国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的反映，其次则反映出由外面渗透进来的国际社会民主党观点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夜，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能否在俄国夺取并保持政权的问题，当时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一齐来反对列宁所提出的问题。他们认为，在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不通过民主革命阶段就掌握政权，——这是意味着强奸历史。我们党——这不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是一伙践踏马克思遗训的冒险主义者的党。我国革命——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批丧失阶级性的散兵游勇的革命，是群众性的掠夺和按人头平分土地的革命。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报刊对待十月革命的中心基调。在我们党内能否找到这种评价的间接反响呢？对此是毋需有所怀疑的。它在那些在十月战斗的关键时刻动摇的人的错误中得到了共鸣。我们想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当前错误的谱系应当追溯到他们在十月前夕的错误，不是出于论战的理由。我们在后来以及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也看到了这种悲观主义倾向。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期间，都为我们同德帝国主义达成妥协而责难我

们不够左，不够彻底。奥托·鲍威尔和考茨基这两个人预言，我国的革命必然要蜕变为纯粹资产阶级革命。他们证明，我国将必不可免地走上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些观点在我们党内以及西欧若干共产主义组织中得到了不正确的描述。而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及其接班人工人反对派那里，我们也找到了这种思想的因素。甚至在这样的组织中，象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基础的斯巴达克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也会走错步。例如，在1918年9月斯巴达克联盟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四面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包围的单独一个国家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事。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要是它的政策会动摇对国际社会主义的信任或是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个党是必然地要垮台和灭亡的”。接下去又说：

“如果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及时给予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以援助的话，它就注定要遭受可怕的失败，同这种情景比较，巴黎公社的命运就会是一种儿戏”。

但是，如果在德国同志那里，这种看法是出自一种必须立即给俄国无产阶级以支持的责任感，如果它同时表达了德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的国际主义情感，那么，在目前的俄国散布这一类看法，就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对俄国革命力量绝望与丧失信心的反映。

正是现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联共（布）党必须经受住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相当疯狂的攻击。我国革命的现时期，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课堂，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课堂，而各国的社会

民主党则通过各种手段力图压抑工人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起来的同情。社会民主党人早已公开宣告，我们已经进入热月时期；我国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别的，无非是“国家”垄断的经济；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社会主义，而只有带着吞食一切的、膨胀臃肿的官僚机构的国家资本主义。我国的工人阶级，——他们不是新的社会关系的主人和建设者，他们是受剥削的奴隶。城乡资产阶级充塞在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最后，我们党已经蜕化变质了。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著名的孟什维克达林在其《战争与革命之后》一书中所写的内容，就足以看清无论是在联共（布）或是德国共产党的若干反对派组织中我们所观察到的悲观主义流行症究竟来自何方。我们的反对派，在这里不敢重述他们在党的十四大上提过的关于我国工业的性质、关于同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所有提法；他们想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攻击是不带恶意的。然而我确信，在这个理论的外表下，正隐藏着我们的反对派的完整的热月思想体系。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 问题的国际意义

这个热月思想体系不仅是对我国革命的，而且是对着整个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的。它不仅动摇人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而且它还破坏对社会主义的整体的信念。这一点，对欧洲的无产阶级——它在国界上同我们隔开，不可能时刻观察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来说，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如果说，关于工人阶级能否夺取政权的问题，关于工人阶级能否保持政权的问题，对于我们苏联的无产阶级已经是属于过去阶段的事情，如果说，当前只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我们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那末，对于西欧的共产党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欧洲无产阶级的意识里，这三个问题是互相不能分割的，它们组成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全部。从这个概念中抽掉某一个环节，人们就会对整个扩展的社会主义纲领产生怀疑。要是有人走到无产阶级跟前并且对他说：“我们相信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时期掌握政权是做得对的，我们认为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有本领对付内外的反革命势力的，但是，当无产阶级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起，我们就开始产生怀疑了”，这样做怎么行呢？可是我们的反对派恰恰正是提出这样的问题。每一个既不懂引证又不谙论战的奥

妙的工人不得不问一问自己：“如今我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牺牲，是不是在做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任何有觉悟的无产者都不能不考虑掌权之后的日子，他们能否对付得了各种经济困难，那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否会比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世界更强大，更稳固。欧洲工人在各个革命阶段中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无聊之举，它们都是在近年来全部事件的进程中提出来的。无论在当前的英国罢工中，或是在中国革命中，都提出了这些问题，1923年的德国革命亦提到了它们。且拿英国这样的国家为例。英国革命在无产阶级掌权后的第二天所遇到的困难，将比苏联无产阶级所碰到过的困难要大。我们俄国没有海外殖民地，苏联的领土绵延数千俄里。我们有巨大的不会饱和的国内市场，有丰富的资源和粮食后备。在英国，事情就全然不同。同英国的改良主义者结成联盟的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就已经用大不列颠瓦解的幽灵来恐吓无产阶级；自治领将会脱离，殖民地丧失，欧洲联盟将被恢复起来反对英国，美国将威胁要对胜利了的英国无产阶级实行军事干涉。贝尔同志已经在自己的演说中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提出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怎样回答呢？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关于美洲和欧洲的书中给予了回答，他认为英国无产阶级胜利的保障在于形成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但是，这种欧洲社会主义联邦要以全欧洲的革命为前提，而这无疑是具有极大或然性的前景。大不列颠在欧洲经济中占据了过于中心的地位，英国的革命——根据1848年革命的成例——不会立即得到大陆的反响。但是，如果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稽延了，如果欧洲社会主义联邦推迟出生，我们该怎样答复英国无产阶级呢？英国

无产阶级要同时对付美国资本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它能支持得住吗？我们就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法本身作答：是的，正如贝尔同志代表英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一样。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例子。中国的经济比革命前的俄国更加落后。中国对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较之我们在战前要大得多。因此，国际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斗争，就将采取比对付俄国革命更加残酷无情的形式。须知中国革命这是破坏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部稳定的最强有力的因素，须知中国革命的工农道路的胜利将会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惨重的失败。但是，中国革命正面临着国际上的种种困难，要是怀疑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目前形势下能否将这一革命转上社会主义轨道呢？

1923年德国革命向共产国际提出的亦就是那个问题。帝国主义列强，在占领鲁尔期间，为扼制德国革命而收缩包围圈，比十月革命前对付我们的还要紧。德国那时没有煤，它的工业濒临崩溃的威胁，它不象俄国那样幅员辽阔可以周旋，德国的农民群众也没有象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那样，同德国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无产阶级应不应该依靠同苏联无产阶级的同盟，投入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战斗，应不应该克服对明天的恐惧心理？只有在我们的问题提法的范围内，我们才有权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对待1920年的意大利也是一样。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在自己投降之后，拿经济方面的困难来为自己申辩：意大利既没有自己的煤，也没有自己的铁；它对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性，比过去沙皇俄国